遵循唯物史观推进“四个全面”

贾高建

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统筹实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一战略布局涉及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特别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深刻认识“四个全面”的内在要求，推动这一战略布局的顺利实施。

一

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成果，在历史观方面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它克服了社会历史领域的特殊性给人们造成的认识上的障碍，揭示了这一领域的客观规律，以及由这些规律所支配的必然趋势。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虽然在社会历史领域活动着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此，要深刻认识我们党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不能仅仅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应该着眼于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从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角度去认识。

首先应该看到，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最终实现社会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过去长期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阶段，现代化进程相对迟滞。新中国成立后，这一进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展开；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化建设更是从各个方面加速推进。按照我们党确定的“三步走”战略，我们将在经历“温饱”阶段和“小康”阶段之后，于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经过努力，到20世纪末时，我们已基本实现了前两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正如当时党的十六大所指出的，这时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根据进入新世纪后的新形势，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定为“实现现代化战略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之后，党的十七大在十六大确立的整体目标的基础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党的十八大则在对各领域发展作出新的规划的同时，进一步要求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说，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现阶段的战略目标，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实际，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有了正确的战略目标，还必须有确保这一目标实现的手段。这同样需要根据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规律，从各个方面采取措施。社会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对社会各领域的体制机制作出调整和改变，因此必须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改革破除那些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旧体制、旧机制，建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需要的新体制、新机制。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有健全的法治体系作保障，因此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提出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在党，因此必须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这样一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便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必需的重大战略举措，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构成“四个全面”的整体战略布局。

二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体现了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规律及其所决定的历史必然性，而要将这一战略布局真正付诸实施，还必须进一步认识这些规律，并以此为依据去进行各方面的具体实践。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领域以及其他社会领域所构成的完整的结构体系。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各个构成领域不是机械地堆积在一起，而是依据其内在机制有机地联系着的；由此出发，可以进一步区分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层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两对矛盾相互联结，形成社会基本矛盾，制约着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存在和发展。而社会各个构成领域本身，还有着各自的规律；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也同样是相互制约和联系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历史领域的这些规律同自然领域的规律一样，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的社会活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自觉遵循这些规律，而不能忽视和违背这些规律。

应该明确，我们党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社会结构体系的某一个构成领域，而是着眼于整个社会，是一个全方位的整体目标。按照十八大报告的论述，这一目标是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相对应的，具体包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各项内容。而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所有这些不同领域的建设目标并不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而是紧密联系和统一着的；要真正实现这些目标，就不能将它们分割开来，片面地加以对待，而必须着眼于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各个领域的建设协调起来加以推进，使这些目标从整体上得到实现。如果只是注重某些领域的建设，而忽视或放松其他相关领域的建设，就会使小康社会建设的整个进程出现失衡乃至脱节，最终影响到整体目标的实现。

“四个全面”中的战略目标是如此，各项战略措施也同样是如此。就全面深化改革而言，这里同样涉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及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也同样是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的，必须依照社会结构体系有机联系的内在机制，特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全面深化改革还包括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的建设属于社会政治领域，这方面改革应与政治体制改革统筹把握；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则涉及社会领域与自然领域之间的关系，必须按照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联系机制有序展开，并与社会结构体系本身的各方面改革协调统一起来。三中全会的《决定》特别提出，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也一再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应深刻理解和把握。而从根本上说，无论哪个领域的改革，改什么，如何改，都要以客观规律的要求为依据，而不能主观随意地去进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根本决定因素。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面，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也同样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法治体系建设属于上层建筑，因而必然要受到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关系的制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具体实践，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相适应。应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现实基础。而在上层建筑范围内，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之间也会相互影响和制约，法治体系建设应纳入政治建设的范畴，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统筹协调；此外还需要得到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支持。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从整体上提高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水平，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创造必要条件。

对于全面从严治党来说，也存在同样的要求。党的建设也属于上层建筑，当然也需要协调好与上层建筑范围内其他进程之间的关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法治体系建设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但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则是要处理好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应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决好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基础问题。目前我们正在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从这一斗争所遇到的复杂情况看，各种形式的权力寻租和非法利益输送，都是以经济关系领域中存在的缺陷和弊端为前提的。只有下气力将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到位，特别是在一系列难点问题上取得突破，才能真正使反腐败斗争立于不败之地。

三

历史唯物主义突出强调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客观规律，要求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但这决不意味着否定人的主体性，似乎只要消极地顺应和服从这些规律就可以了。恰好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十分重视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及其主体性的发挥，认为主体不是一种被动的和消极的存在，而是能动的、积极的存在，人们完全可以发挥自身所特有的能动作用，通过自觉实践而影响和改变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主体选择在社会历史进程的具体展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应该把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机械地对立起来。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观点，我们在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过程中，就应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通过自觉实践达到预期的目的。应该说，我们党提出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本身就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所作出的充满智慧的路径选择；而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这一进程中的阶段性目标，更是一个创造性的设计和安排。但是，要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奋力开拓。“全面小康”是干出来的，等是等不来的。我们应进一步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美好未来。

我国的改革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难免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障碍。而改革越是深入，难度也就越大。如今，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面对的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全面深化改革，对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无疑有着很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一要有更大的勇气，不畏艰难，敢于突破；二要有更多的智慧，能够驾驭复杂的局势。现阶段改革任务的这种复杂性和艰巨性，既带来严峻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发挥才干、建功立业的历史机遇；我们要敢于担当，迎难而上，为全面深化改革贡献力量。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现阶段我国的法治体系还很不完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面临诸多难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同样需要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进一步理顺关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特别应注意的是，现代法治体系的建立不仅需要有一整套完备的法律体系以及立法、执法、司法等相关制度体系，同时还要求社会成员具备相应的法治观念和意识。而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传统社会，“人治”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的特征仍广泛存在。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必须从主体自身素质的提高入手，打破传统局限，促进观念转变。

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关键环节，全面从严治党对于主体能动作用的要求更为直接。要从根本上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加强各方面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但同时还应充分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问题，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根守魂”，自觉抵制和反对各种不良倾向，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党的各方面建设最终是要通过人来推动的，只有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才能确保这一重大战略举措取得应有的成效。

（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

热点透析

智慧城市建设需拓展发展路径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 李 铁

提要 中国的智慧城市，只能说是刚刚起步，还需要完成以下几个方面的进程：第一，如何通过企业来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第二，如何使碎片化的、分割的智慧城市发展模式，变成一个整合性、综合性的发展模式。第三，如何实现企业的跨界经营和管理，来促进利益的分享。第四，如何完成家庭、社区、就业产业园区和城市的整体结合。

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才刚刚达到55%，就开始和高科技、互联网结合到一起了，而那些发达国家在人口城镇化率55%的时候，经历的不是战乱就是传统技术。所以在这么一个时代里，我们面对怎样去运用这些新技术，以及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来帮助我们完成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谈智慧城市建设，确确实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智慧城市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个人既有一些含含糊糊的感觉，又有一定的疑问。因为每个人从政府、企业、个人角度来看待智慧城市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解读。智慧城市这个概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定论；作为一个市民怎么样来认识互联网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是不是使我的家庭能更快地智能化，使所有的电器通过一种智慧的方式连接起来？我们的社区能不能发生一些变化，让我们不要去频繁地为家庭的社会服务，为保姆、为装修和小区的整修等各种问题所困扰？我们的就业怎么样和产业融合得更紧密？智慧城市、“互联网+”能不能和实体经济相结合？

从另一方面看，每个市民都要接受政府的服务，政府的服务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所谓大数据、云计算和每个市民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谈智慧城市的时候，可能更需要互联网，需要智慧的东西给我们提供更丰富的内容，而且这会带动社会出现整体的变化。

互联网的大企业家们谈到了我们互联网是一种线性的发展模式，就这一个行业在往前猛推，来扩展市场，扩张的速度非常之快。但是它和其他行业之间的整合关系确确实实还有待提高，需要我们更多的考虑商业模式的建立。

特别是从企业方面来说，中国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企业家这个主题。企业家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企业家通过市场推动，速度非常快，很少有体制束缚、约束。第二，有了利益，企业才能发展，所以企业家效率非常之高。第三，创新过程中企业的推动力量是远远超出政府的，在智慧城市的创新过程中也是如此，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

从政府方面来说，重要的是要看政府是不是还站在传统的政府模式上来管理大数据。应有一个整合式的管理模式。到目前为止，我们碎片化的智慧城市强调了社区服务，强调了微博政务，也强调了各种大数据的模式，但是，是不是能和城市的整个社区，和老百姓全方位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和政府公共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恐怕还有非常大、非常广阔的提升空间。

在城市的治理和管理以及整个智慧城市建设中，创新的推广尤其重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是从大城市的社区；第二是从中小城市。因为当在布局一个特别大的城市的时候，整个系统的建立非常麻烦。而通过小的载体来迅速地植入一些创新的要素，它会通过复制来迅速地推广蔓延，会形成非常好的示范效应，这对我们国家的智慧城市带动创新会有巨大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在很多国家，创新推广方面的经验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小”开始进行广泛的示范。日本、韩国、美国也都如此。希望中国在智慧城市的治理和创新上，两个方式并举，通过企业家为主导的推动，小的社区开始推广示范，最后来影响政府和企业家的结合，也影响中小城市和大城市这种广泛的结合，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智慧城市的创建体系。

中国的智慧城市，只能说目前是刚刚起步，还需要完成以下几个方面的进程：第一，如何通过企业来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第二，如何使碎片化的、分割的智慧城市发展模式，变成一个整合性、综合性的发展模式。第三，如何实现企业的跨界经营和管理，来促进利益的分享。第四，如何完成家庭、社区、就业产业园区和城市的整体结合。

如果从这四个方面解决了我们智慧城市的发展路径，既借鉴国际经验，又使我们在城镇化率达到中期阶段，就可以通过这个庞大的市场空间来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的智慧城市可能会有一种新的展现。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企业家、地方政府，包括国际合作，能共同地促进，以中国这个大市场来促进样板城市获得成功。

决定大国兴起的五种动力

中共中央党校 韩保江

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从根本上说是由世界经济发展及其不平衡规律决定的。创新能力与科技进步、资源禀赋与人口、开放与学习等既是决定世界经济发展快慢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大国兴衰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主要变量。这里试分析决定大国兴起的五种动力。

创新能力与技术进步是决定大国兴起的根本动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人类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所著的《大国的兴衰》中，通过分析500年来世界大国兴衰的经验与教训指出，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

资源禀赋与人口是决定大国兴起的基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所著的《经济学》中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其经济增长都要依托“四个车轮”，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积累和技术。因此，一个国家拥有人口、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等资源禀赋如何，将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与此同时，一国应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生产此种要素密集型产品，增加本国优势和福利。当然，资源禀赋状况只是决定经济增长和国家强大的必要条件，要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还需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和良好的经济制度。

资本市场与金融创新是决定大国兴起的关键。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除了1929年至1933年大危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以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外，在绝大多数时期，美国经济都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究其原因，最基本的动力就来自于科技创新。美国经济的每一次飞跃都与科技进步和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不能忽视的是，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变革而日益明显。实际上，每一次科技进步和创新都与金融的发展密不可分。如果说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前进的内生因素；那么，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则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生力量。

开放与学习是决定大国兴起的条件。任何一个国家，无论自身的资源和要素禀赋有多丰富，也不可能靠“自给自足”的封闭发展和固步自封而实现强大。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并善于学习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经验以及制度文明，是实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力强大的必由之路。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决定大国兴起的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及治理能力的强弱，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从世界上看，不同国家的治理体系各不相同，治理能力也存在差异。但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没有比较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比较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就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不可能形成国家建设和发展所必需的向心力、凝聚力。

本版编辑 裴珍珍